

工业发展如何破解产业扶贫的困境？

——基于南康家具产业“产业+就业”扶贫模式的研究

秦宇 钟群英¹

【摘要】：实现全面脱贫后，中国减贫工作将由消除绝对贫困向减少相对贫困和实现高质量脱贫转变。本文通过对赣州市南康区家具产业扶贫机制研究，阐述了工业产业扶贫如何有效破解现阶段我国产业扶贫中存在的产业选择非可持续性、参与主体关系界定不清晰和脱贫工作短视等问题。研究发现，通过“产业+就业”的工业产业减贫模式，赣州市南康区依托家具产业有效化解了短期扶贫目标与地区可持续发展、贫困户短期收益与产业长期发展、贫困人口被动式脱贫与贫困地区人力资本长期提升和高质量脱贫等长期与短期利益矛盾。该扶贫模式不仅给即有政策导向提供新的扶贫思路，也为工业产业扶贫实践提供了可以供借鉴的成功案例。

【关键词】：工业产业 扶贫 南康 产业+就业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5024(2020)12-0131-09

一、引言

2020年是中国决胜脱贫攻坚的关键时点，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确保到2020年中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自2013年我国提出精准扶贫以来，经过7年的精准扶贫，特别是4年多的脱贫攻坚战，在现行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2012年底的9899万人减少到2019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县从2012年底的832个减少到2020年初的52个^[1]。按照党和国家的部署，到2020年底，我国必将高质量实现脱贫攻坚既定目标，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突出短板”。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标志着长期困扰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根本解决。但贫困人口是陷贫与脱贫两种不同类型的贫困人口的动态变化过程^[2]，脱贫攻坚取得伟大胜利并不意味着扶贫工作的完结，未来中国减贫事业仍将面临诸多挑战。

进入新时代的中国扶贫事业要实现高质量、高标准推进，不仅要构建包容性的扶贫机制，提升贫困人口自身发展能力，也要因地制宜，培育贫困地区可持续性特色产业，继续把培育产业、促进产业兴旺作为贫困地区脱贫的重要抓手^[3]。因灵活性和“造血式”扶贫特征，产业扶贫在我国精准扶贫中被广泛推广。由于中国的贫困主要是农村的贫困^[4]，农村固有的农业资源及农业劳动者人力资本相对较低、生产力相对落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天然属性使得农业产业成为我国产业扶贫的重点产业。相应的，我国扶贫政策也多集中于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业现代化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完善和农村人口收入提升等领域^[5]。但农业产业的局限性使得我国多数地区产业扶贫面临扶贫资源错配、产业自生能力不足、贫困人口增收不显著、返贫风险大等低水平脱贫困境^[6-7]。

¹**作者简介**：秦宇，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编辑，博士，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北京100006）

钟群英，江西省社科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研究方向为农村发展与产业扶贫。（江西南昌33007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19ZDA048）；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农民获得感的连片特困区精准扶贫绩效评价及脱贫巩固路径研究”（项目编号：19BJL038）；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战略优势学科“产业经济学”成果

纵观中国扶贫历程，伴随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农民从相关的非农产业活动中受益良多，农民家庭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收入来源也渐趋丰富^[8]。非农收入的提升可以分担农业生产风险带来的收入和消费波动，推动农户收入稳定提升的同时也反哺农业活动得以顺利开展^[9]。我国仍然有许多贫困地区处于农业向工业化过渡或工业化发展初期阶段，工业产业难以支撑地区脱贫并形成可持续的自生发展动力。其原因有三：一是我国贫困地区多集中于农村，尤其是老少边穷的农村地区，长期二元经济体制导致这类地区的资源禀赋多为农业资源及低人力资本劳动力，资本、技术比较欠缺，地区工业产业发展十分滞后，短期内难以形成体系。二是贫困地区剩余劳动人口素质偏低，短期内难以培育出能够从事现代工业体系生产的人力资本。三是产业扶贫投资的急功近利与工业产业体系建设的长期性矛盾使得工业扶贫多为政府行为而缺乏市场行为，工业产业扶贫“造血”功能无法显现。

基于以上原因，现有关于产业扶贫的理论研究及案例探讨更多地聚焦于农业产业发展和乡村旅游开发及其相关产业链。在实践中，基于区域比较优势而构建工业产业实现减贫的案例相对较少，理论研究也仅是指出工业产业对于减贫的重要意义，具体的案例分析和理论构建不足。本文试图从工业产业扶贫视角，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家具产业扶贫为案例，分析贫困地区如何依托自身发展优势和产业基础，通过建立可持续发展工业产业，带动贫困人口脱贫，并形成稳定的脱贫内生动力与能力。

本文有两方面的创新：一是研究视角的创新。现有文献多集中于研究农业及旅游业发展及其扶贫经验，对于工业产业发展推动地区扶贫的研究相对不足，本文从工业产业发展的视角切入，研究工业产业对于地区脱贫的有效路径与经济成效，有助于完善产业扶贫的理论研究体系。二是研究对象的创新。以往案例研究很少关注到贫困地区如何通过工业产业实现脱贫，这既是因为相关案例及经验相对较少，也是因为农业产业脱贫是当前政策倾斜的领域。本文以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家具产业扶贫为案例，介绍当地如何通过培育家具产业实现带动区域内及周边地区贫困人口脱贫，不仅给既有政策导向提供新的扶贫思路，也为工业产业扶贫实践提供可以借鉴的成功案例。

二、产业扶贫的现实困境及工业产业扶贫的必然趋势

（一）现阶段产业扶贫模式及其困境

通过扶植产业推动地区发展并脱贫已逐步成为目前我国开发式扶贫的主导政策与实践形态，并在各贫困地区探索出多种产业扶贫模式^[10]。需要注意的是，各模式均需处理好三个关系：一是特色产业的选择。受资源禀赋与技术能力约束，贫困地区特色脱贫产业选择多集中于种植、养殖等生产环节，对产后加工、销售环节支持不足^[11]，部分贫困地区依托自身农业资源、自然资源、文化特色、历史遗迹通过特色旅游业推动产业脱贫，但资本、人才和特色性的不足导致现阶段我国旅游扶贫总体水平偏低^[12-13]，贫困户收入提升有限，认可度低^[14]。目前选择工业产业扶贫的地区还十分有限^[5]，而工业化其实是提升居民收入的有效途径。二是脱贫参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包括政府如何从产业组织者、资金提供者向企业、贫困户脱贫的服务者和产业维护者转变；也包括企业如何参与产业扶贫，如何处理好与政府、贫困户及合作社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依托扶贫政策及资金实现经济效益与产业规模目标，从而实现自生及带动地区产业发展；更包括贫困户如何从产业的被动接受者向产业技能的掌握者转变，如何摆脱对政府扶贫资金的依赖，成为脱贫的主动方乃至企业的经营者等^[15-16]。三是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关系。其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短期扶贫目标与地区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17]，贫困户短期收益与产业长期发展之间的关系^[18]，农户被动式脱贫与贫困地区人力资本长期提升和高质量脱贫的关系。

现阶段，我国产业扶贫在处理以上三种关系的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首先，在产业选择中，农业产业存在附加值低，农村劳动力持续减少^[5]，农业生产同质性高，市场竞争压力大等困境，加之农业产业抗风险能力弱、市场波动大^[11]，将持久脱贫的希望仅寄托于农业并不符合经济规律。而由于专业人才、基础设施的供给不足，信息闭塞、环境承载力和环境资源保护压力等问题造成贫困地区旅游产品开发技术落后、水平不高^[19]，旅游产业扶贫效果并不都是那么理想。其次，在参与主体关系方面，作为产业扶贫的主体部门，自上而下的行政化推动容易导致决策越位现象，政府越位决策往往伴随较强的行政干预和市场弱化，导致产业发展主体之间缺乏长效性的利益联结机制，扶贫产业难以经受市场的考验，持续性差^[11]。过强的行政推动易导致产业

扶贫项目出现“水土不服”和“精英俘获”现象，贫困群众从产业项目中获得收益十分有限且难以持续，其本应作为扶贫产业参与主体的地位被忽视，只能被动参与扶贫^[17]。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盈利性与扶贫公益性之间的矛盾是企业作为扶贫参与方所需要平衡的，富裕的企业与贫困户之间资源博弈和利益分配机制的缺位、现代工业文化与传统农业文化形成的文化冲突矛盾以及企业建设与当地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是产业扶贫进程中企业与农民的主要矛盾^[20]。帮扶企业容易陷入高投入资本、高管理成本与对政府资源的高度依赖的“三高困境”^[18]。最后，在行政绩效考核和产业发展长期性的双重压力下，很多地方片面强调利用经济补偿手段达到脱贫要求，忽视产业扶贫的“造血”功能，在产业选择上主要选择投资小、见效快的“短平快”产业，多集中于种植、养殖等生产环节，或只是产业的简单引进，忽视了产业培育和产业长期发展的规划性，无法有效推进精准扶贫与地区发展、脱贫攻坚与乡镇基层政权建设的协调发展，影响稳定脱贫、长效脱贫^[11]。而这种沿袭了小农特色的产业扶贫模式和地区产业规划的短视造成了产业扶贫对贫困人口的技术和能力培训收效甚微^{[17][21]}，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提升不明显，对产业扶贫的获得感和认同感不高。

（二）工业产业为产业扶贫提供动力

破解上述困境，提升产业扶贫绩效需要把握四个关键：一是产业发展选择既不能急功近利，亦不可好高骛远，应基于自身特色培育具有长期、稳定发展潜能的优势产业进行培育。二是贫困人口有效参与产业发展是其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和分享发展收益的关键所在。三是产业要素的集聚并逐步形成规模效应，扶贫产业应具备吸引外部资源和有效整合本地资源的能力。四是产业体系的构建，强化纵向产业延伸与横向产业融合。中国持续的工业化进程和工业体系的区域转移为破解产业扶贫困境提供了工业产业扶贫契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工业化和国家整体的工业化以及迅速的城镇化构成了中国大规模减贫的基本动力^[22]。农民从农业生产向非农生产的转移以及非农收入的提升不仅快速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23]，还增强了农民抵御经济波动风险的能力^[24]。工业化发展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了机遇，不仅拓宽了农户收入来源，更能分担农业生产风险带来的收入和消费波动，有效降低了贫困发生率。

贫困地区工业产业扶贫不仅能直接通过带动贫困人口工业产业就业而提升其收入水平，更能够为其提升人力资本，积累资金、技术、经验，为自主创业与经营提供培训途径，真正实现“造血”式扶贫。与此同时，基于地区优势而长期培育起来的工业产业集聚形成的规模需求既能带动当地发展，也可以向周边辐射，增加周边区域居民财富，实现区域脱贫^[25]。当前扶贫政策也为地区实现工业产业扶贫提供了支撑：一方面，持续的扶贫和农村建设为贫困地区工业产业发展提供了较高素质的人才和基础设施条件；另一方面，扶贫工作的不断深入也为工业企业生产要素补充和产品市场扩展创造了良好环境。

然而，工业产业扶贫也面临一定的挑战。首先，短期内工业产业建设难以形成体系和规模，工业产业布局需要对区域优势清晰的认知与科学的规划。其次，工业产业建设需要相应资源的投入，包括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土地、资金等。最后，工业产业布局与地区环境之间的平衡是地区可持续发展应重点关注的领域。

三、南康家具产业现状及其扶贫成效

（一）南康家具产业现状

南康是江西省赣州市辖区之一，是中国实木家具之都。因人多地少，故“男做木匠，女做裁缝”成为南康人主要谋生手段，“木匠之乡”“做木匠活”是千百年来南康客家人的老行当并为南康留下了技艺传承和产业基础。20世纪90年代末期，南康区政府积极支持和引导当地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南康区的木匠技艺传承实现了“出口转内销”。人才是南康家具产业发展的基石和关键，也是南康家具产业最重要的要素市场^[26]。历经20余年的发展，南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实木家具制造基地，2019年产值达1807亿元，全区拥有家具企业9000余家，其中规上企业1022家，标准化厂房1000万平方米，带动相关从业人员50余万人，区域内专业家具市场销售面积260万平方米，家具销售店面12000余间，建成营业面积和年交易额位居全国前列，“南康家具”品牌价值估值达100亿元。在家具产业带动下，南康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2019年物流企业达700余家，其中规

上企业达 30 余家。全国第八个内陆城市开放口岸“赣州港”的建成开通推动赣州融入“一带一路”，南康家具企业从世界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口木材，产品销往世界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实现“买全球、卖全球”。此外，电商平台及大数据的应用、家具特色小镇的高标准规划建设推动南康家具不断向产业链纵深、自主创新领域拓展。依托木匠技艺传承，持续培育和壮大产业，南康家具产业实现了“无中生有、有中生特、特在其人、人联四方”的发展路径。

（二）南康贫困状况及家具产业扶贫成效

南康共有人口 86 万，属原中央苏区县和罗霄山脉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累计建档立卡贫困户 24516 户、90652 人，其中贫困劳动力有 43340 人。截至 2019 年底，南康共有未脱贫在档贫困户 1673 人，主要分为两类人群，一是 2019 年新增贫困人口及返贫人口，二是农村中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虽有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但无赡养扶养能力的老年人、残疾人和未成年人等由政府托底贫困人口。

南康依托家具产业这一千亿产业优势，开展“产业+就业”扶贫工作，并于 2019 年 4 月 28 日实现全区脱贫摘帽。90652 名贫困人口中已有 20201 户 40843 名贫困劳动力实现就业，其中法定劳动年龄内贫困劳动力就业 34887 人，法定劳动年龄外贫困劳动力就业 5956 人，法定劳动年龄内贫困劳动力就业率达到 93.3%，户均就业人数 1.66 人，全区有劳动能力且有就业意愿的“零就业贫困家庭”基本实现了动态清零，使有就业能力的贫困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家具产业吸纳贫困户就业人口达 13161 人，占已就业贫困劳动力总数的 32.35%，人均工资每月为 3000 元左右。依托成熟的家具企业，南康积极推进扶贫车间建设，全区现有在运营的扶贫车间 43 家，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330 人务工就业。

四、南康家具工业“产业+就业”深度融合脱贫模式

产业扶贫不仅要将在产业引进贫困地区，在贫困地区形成产业，更要重视产业的可持续性和可发展性。南康依托本土技艺传承，注重特色、扬优成势，把千亿家具产业作为脱贫攻坚的最大优势和最强支撑，不仅有效地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更走出了一条“产业+就业”的高质量脱贫之路。

（一）家具产业有效解决南康扶贫进程中的产业选择问题

1. 贫困地区工业产业选择与培育机制

工业产业所依赖的要素资源与大多数贫困地区固有要素禀赋不相匹配，培育地区工业产业多需要从无到有逐步构建与扶持，而工业产业——尤其是工业产业集群——培育的长期性使得试错成本极高，因此，选择工业产业扶贫需要依托本地区特色，从资源禀赋、文化传承、社会网络等维度选择具有相对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培育。同时，不应过度追求产业的高级化，工业产业扶贫的选择应兼顾劳动力吸纳和贫困人口技能适应性。工业产业扶贫中，产业的发展是前提，而产业的可持续性则是发展目标和扶贫的持续动力。围绕“产业”这一核心要素，政府是工业产业的主要规划者、引导者和推动者。依托地区禀赋优势，规划产业发展方向和长期路径，通过政府的资源调配优势及政策制定权力引导和扶持产业发展，推动地区工业产业逐步壮大，实现工业产业发展进程中的地区经济带动作用，培育出产业的自生性发展动能，不仅为贫困人口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和提升非农就业收入，也逐步构建起地区特色工业产业以推动地区可持续性和高质量脱贫。企业作为工业产业的主要投入者和参与者，是工业产业活动的主体，且兼具工业产业发展所需技术要素及资金要素。可持续性的工业产业不应是地区政府持续性投入的“输血式”产业，而应依托于企业（既可以是本地成长型企业，也可以是域外引进型企业）构成产业主体，不断发展，逐步形成产业集群并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通过参与扶贫，工业企业可以为贫困人群提供相应的就业岗位，包括公益性岗位，进行培训，建设工业园区和开办扶贫车间等。贫困人口是贫困地区工业产业发展的直接受益人。贫困人口从工业产业发展中获取稳定的就业机会，相较于农业就业，工业就业的稳定性、抗风险性和相对高收入性是贫困人群逐步摆脱贫困状态的有效推动力。

2. 南康家具产业培育及其减贫经验

从南康的经验看，2013 年开始，南康区借助《国务院关于支持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的若干意见》颁布的历史机遇，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多措并举打造千亿家具产业集群，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扶持和引导家具产业发展（见图 1）。2019 年，家具产业集群产值已达 1807 亿元，同比增长 11.9%，主营业务收入达 1714.9 亿元，同比增长 9.5%。家具产业已成为南康的富民产业、扶贫产业，为脱贫攻坚提供了强大支撑和持续动力。

在家具产业带动下，南康积极规划和扶持发展现代金融、物流、商贸、电商等生产性服务业，拓宽贫困人口就业空间。其中，以家具销售为主的电商运营企业通过电商产业平台帮助贫困户实现创收增收。借助“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全国十强国家电子商务示范基地”“中国电商示范百佳县江西首位”“京东南康家具线上馆”等电商平台优势，依托南康家具“买全球、卖全球”的实体产业基础和遍布全国的立体物流网络以及直通全球的内陆口岸——赣州港打造南康“跨境电商产业园”。2019 年，跨境电商企业从最初的 20 家发展到 197 家，电商企业总数从 3810 家发展到 4932 家，电商交易额从 301 亿元增长到 506 亿元。同时，南康依托家具电商企业开展贫困户子女电商技能培训，并通过电商企业的集聚为贫困人口提供就业岗位，与电商平台合作为贫困人口提供创业辅导和支持，包括销售培训、开店辅导和产品供应链资源支持等，通过实施电商平台创业扶贫，带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增收。

南康依托全区各家具产业集聚区规划建设家具产业园及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对搬迁贫困户进行劳动力职业技能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提升搬迁贫困户就业创业能力，增强搬迁贫困户内生动力，并充分引荐贫困户就近到周边家具企业务工，有效解决贫困户易地搬迁之后的就业增收问题。同时，依托产业园和安置点，建设相应的公共配套设施及移民服务中心，既能使贫困户搬迁后享受后续帮扶措施，如就业、就医、就学等，提升人力资本水平，也能为搬迁贫困户提供环卫、家政、保洁等低技能扶贫岗位，帮扶他们就业。同时，还鼓励有条件的家具企业在扶贫搬迁安置点周边及乡镇设立扶贫车间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截至 2019 年底，南康有在运营扶贫车间 43 家，吸纳建档立卡贫困劳动力 330 人务工就业。鼓励企业围绕家具生产、配套、物流三大主力行业，提供压板、上胶、拼接、搬运等岗位，有效吸引贫困人口就业，提升贫困户收入水平。政府给予扶贫车间按照一次性补助和吸引就业人数补助提供扶贫资金支持，2019 年政府补贴达 255.77 万元。

（二）家具产业就业成为南康政府、企业、贫困户联系的纽带

1. 以就业为核心的政府、企业、贫困户角色定位

围绕工业产业，以实现贫困人口工业产业就业为核心目标的扶贫逻辑是解决产业扶贫进程中各参与主体角色定位偏离和关系模糊的有效路径之一。围绕工业产业有效“就业”这一核心目标，贫困户始终作为扶贫工作的核心主体，在政府帮扶和企业融入进程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掌握就业技能、提高就业收入、享受优惠政策，激发其脱贫的内生动力，从而实现稳定就业和高质量脱贫。工业企业是就业岗位的供给方和劳动力的需求方，劳动力密集型工业企业吸纳贫困人口就业的作用显著，工业性生产对于劳动技能的要求推动企业在吸纳就业的同时完成对于贫困人群劳动技能的培训（包括岗前培训和在岗培训），提升贫困人口的劳动技能和生产能力，从而提升了贫困人群脱贫的内生动力与能力。对于低技能劳动者，企业也可通过提供非技能岗位给予援助和帮扶。扶贫进程中，政府的功能定位主要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搭建就业供需平台，帮助贫困户与企业进行对接；二是给予具有自主创业和外出就业意愿的贫困人口资金补助和政策引导；三是为贫困户提供就业培训，帮助他们尽快适应工业生产的技能要求和生产方式；四是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给予贫困人口融入工业生产体系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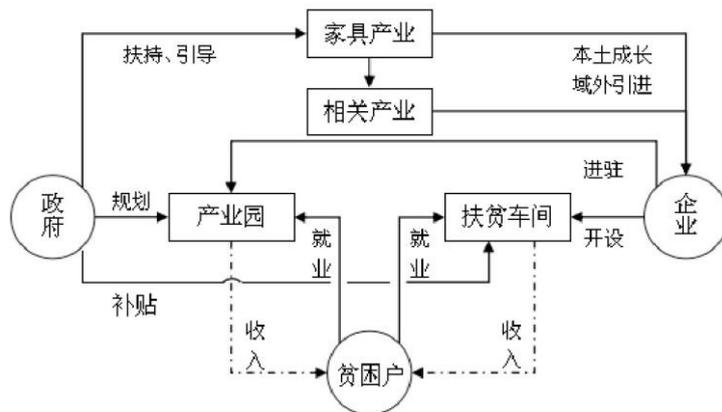


图 1 南康家具产业发展及扶贫机制

扶贫资金的使用是政府功能定位的第五个方面，也是产业扶贫进程中需要解决的关键矛盾。既要摆脱贫困人口及企业对于扶贫资金的依赖性，又要使政府扶贫资金能够切实投给有需要且有意愿脱贫的贫困人口。基于此，政府的扶贫资金在使用上应以促进贫困人口“就业”为激励目标，主要包括三方面的使用：一是推动企业提供就业岗位和岗位培训的资金补贴，该类补贴是通过投给企业所对应的贫困岗位而间接补贴给贫困人口，企业并非是扶贫资金的最终受益人，贫困人口也无法通过“等靠要”形式直接获得补贴，企业获得了生产所需劳动力且并未显著增加生产成本，贫困户则在提升了生产技能和就业收入的同时获得稳定的就业机会。这样既提升了企业的扶贫意愿、降低企业公益行为的支出成本，也促进了贫困人口的就业。二是补贴具有创业及外出就业意愿的贫困户，鼓励贫困人群走出“贫困僵局”，提升自主脱贫的意愿和能力。三是为贫困人群提供社会公共服务和培训等，提升贫困人群的人力资本和生产技能，帮助其跨越工业产业就业壁垒，解决其融入工业社会的后顾之忧。

2. 南康“家具产业+就业”的脱贫经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扶贫要同扶智、扶志结合起来，“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围绕“家具产业+就业”，南康区有效地激发了贫困群众的内生动力。南康政府通过企业设岗补贴及贫困户激励补贴有效运用扶贫资金，鼓励贫困户消除“等靠要”思想，通过就业带动贫困户脱贫（见图 2）。设岗补贴方面，首先，南康政府鼓励家具生产企业设立扶贫岗招收贫困人口就业。从 2017 年开始，南康为企业所设各扶贫岗均提供工资补贴 300 元/月，社保补贴 50 元/年（企业购买社保费用平均 120 元/年）。其次，鼓励企业设立扶贫车间，并根据扶贫车间所吸纳的贫困劳动力就业人数，每月给予场地租金及水电费补贴 450 元/人，同时给予扶贫车间一次性建设补助资金 10 万元，对地处边远、产业基础薄弱的贫困村开办的扶贫车间，可再给予 5 万元补助。扶贫资金以企业设置扶贫车间和提供扶贫岗位的方式补贴给贫困人口，有效推动贫困人口由被动脱贫向主动脱贫的转变。与此同时，企业吸纳贫困人口就业，既解决了劳动力来源问题，也通过政府补贴降低了扶贫压力。贫困户激励补贴的设计也是基于鼓励贫困户主动就业创业，变被动脱贫为主动脱贫，激发内生动能。如，南康给予外出务工的贫困劳动力交通补贴，每年工作满六个月，区内务工补贴 1000 元/年/人，区外务工补贴 1500 元/年/人。

实现稳定、长期脱贫不仅是贫困户收入水平的提升，更要求贫困户具有一技之长，能够胜任工业生产所需技能要求。南康政府及家具企业相继提供了多种的技能培训模式，帮助贫困户提升技能水平。围绕千亿家具产业及相关配套产业链，南康政府与企业合作，开展了贫困劳动力培训意愿摸底调查，并按照其意愿采取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岗前培训、企业在岗培训等，提高培训与就业的匹配度，提升劳动者就业水平，转变就业理念。2019 年全年，南康完成贫困劳动力扶贫培训人数 3321 名。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贫困户劳动力，培训期间给予 30 元/人·天的生活补贴（累计不超过 300 元/人）；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培训合格证的，给予 500 元/人的一次性求职补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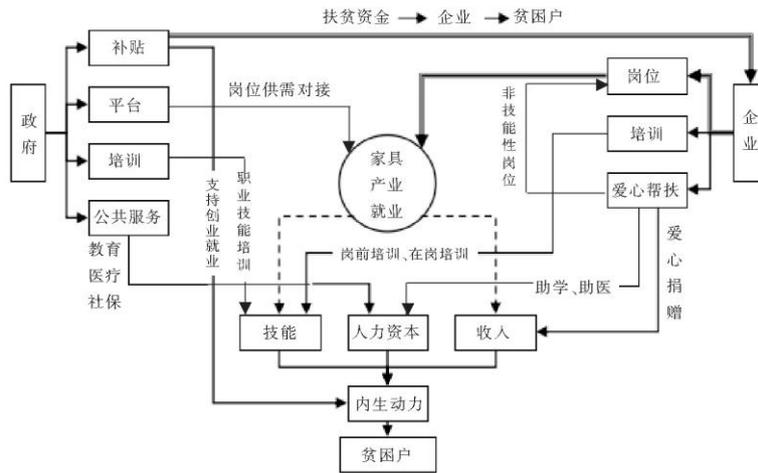


图2 南康家具产业扶贫参与主体关系逻辑

南康还积极搭建就业服务平台，帮助失业贫困劳动力充分就业。集中在家具重点乡镇和家具产业园区搭建产业扶贫平台，鼓励企业打造扶贫车间吸纳贫困劳动力就业。在家具生产、家具配套、家具物流三大主力行业上通过“设立专岗安置一批、技能培训带动一批、师傅带徒帮扶一批、交通补助引导一批、结对励志影响一批”等方式鼓励贫困人口就业。为解决工业产业就业的贫困人口及其亲属生存压力，南康出台了相应的医疗、教育、住房保障等扶贫政策。保证贫困人口有病可医、有病能医，对贫困家庭子女各教育阶段学费减免，发放奖、助学金，提供住宿、生活费、交通、实习补助和助学贷款等，有效提升了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此外，家具企业通过设立非技能岗位带动低技能和低人力资本贫困人口就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也相继结对帮扶贫困村、贫困户和贫困学生，帮助贫困户提升“造血”能力。截至2019年10月，南康家具企业累计捐资捐物超过2200万元，帮扶贫困学生2458名，帮助贫困村发展特色产业、改善基础设施，营造了全社会支持、参与脱贫攻坚的浓厚氛围。

（三）家具产业与就业有效化解南康扶贫的长期与短期利益选择

2020年是我国脱贫攻坚的决胜之年，在目标紧、任务重的情况下，不少地区扶贫工作难免出现短期扶贫目标和长期发展利益相冲突的问题。南康的经验显示，通过发展和培育家具这个千亿产业、优势产业，有效地解决了扶贫目标与地区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见图3）。家具产业的发展不仅带动了南康经济发展，构建起以家具产业为核心的产业体系，并通过信息化与数字化逐步实现产业升级，从而成为南康长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而且，家具产业的劳动密集性和低技能性特征又给产业扶贫带来了机遇，通过就业带动，家具产业的发展有效解决贫困户就业问题，同时，依托南康家具产业集群成长起来的当地企业也会回馈社会，帮助贫困人口脱贫。依托“家具产业+就业”，南康有效地将扶贫目标与地区长期产业规划和发展相结合，为我国其他贫困地区通过工业产业脱贫提供了借鉴。

一般来说，在工业产业就业所带来的收入普遍高于农业生产收入。南康家具产业从业贫困人口月均工资可达4000元，家具关联产业如包装、物流产业可吸纳低技能劳动力和妇女劳动力就业，月均工资可达3400元，企业雇佣保洁员、安保员等公益性岗位也会按照南康最低工资标准提供薪资。工业产业受季节性和突发性外生冲击影响较小，相对农业、旅游业有更为稳定的就业保障和收入水平，贫困人口收入显著提升。南康人多地少，劳动力丰富，家具产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成本低，加之政府对于贫困人口就业予以岗位补贴和培训补助，既实现了企业扶贫的社会公益目标，也有效地保护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盈利性目标，较好处理了贫困户短期收益和产业长期发展的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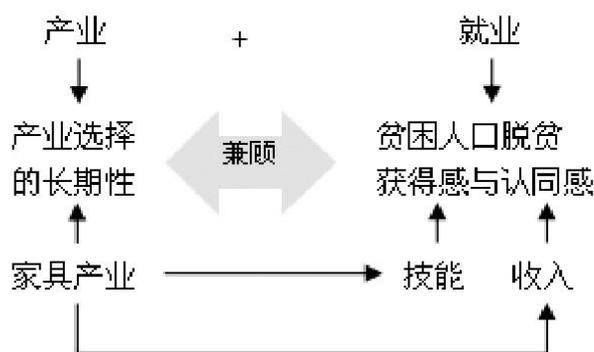


图3 “产业+就业”的扶贫长效机制

贫困人口在工业产业就业不仅带来工资收入的提升，也能够工业获得在生产过程中所需技能与相应的人力资本水平。南康依托家具产业链开展就业培训，帮助贫困人口掌握一技之长，使得他们具备了脱贫的劳动技能基础。而相对较高的收入水平及其带来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的改变，又进一步提升了贫困人口的脱贫意愿，做到了扶志与扶智相结合，提升了贫困人口的获得感。政府出台的激励政策和提供的社会公共服务、企业提供的就业培训和扶贫岗位有效解决了贫困人口家具产业就业的后顾之忧，提升了贫困人口的认同感。南康“家具产业+就业”的扶贫模式解决了贫困人口的被动脱贫激励困境，也提升了贫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降低了脱贫人口返贫的可能，实现高质量脱贫。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以南康家具产业“产业+就业”扶贫模式为例，阐述了工业产业在产业扶贫中如何解决地区产业选择，各主体之间及长期利益选择的实现路径。通过可持续发展的工业体系的建立，南康有效兼顾了脱贫产业与地区长期经济发展之间的利益关系，围绕贫困人口就业所推出的家具产业扶贫政策使得各参与主体定位清晰，“产业+就业”的扶贫模式有效地化解了短期扶贫目标与地区可持续发展、贫困户短期收益与产业长期发展、农户被动式脱贫与贫困地区人力资本长期提升和高质量脱贫等长期与短期利益矛盾。南康模式为工业产业扶贫提供成功的参考案例。

（二）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启示：

1. 因地制宜培育特色工业，构建可持续性、抗风险性扶贫产业

农业扶贫往往存在主体产业抗风险性较低、扶贫参与主体关系界定不清晰、产业的地区长期经济带动能力不足等问题，使得贫困人群脱贫的获得感和认可度不高。因此，有条件的地区应依据自身资源禀赋，选择通过发展工业带动地区脱贫。但贫困地区需要清晰定位自身工业化发展阶段和资源禀赋，不可急功近利，通过政府引导、资源汇聚、企业扶持与引进、农户培训与就业等阶段逐步构建地区特色工业。同时，不可好高骛远，一味追求高端产业。工业体系建立与培育应注重结合自身优势与发展传承，劳动密集型工业既能有效解决贫困人口就业，又比较适应贫困地区工业基础，对于贫困地区工业化起步往往更为适宜。

2. 让贫困人口成为脱贫主体，为其提供稳定的就业机会

工业就业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最有效、最稳定的途径，而贫困人口脱贫的本质是实现增收与提质。所谓增收，即为其提供更高水平和可持续的收入来源，地区政府应为贫困人口创造进入工业生产进而实现增收的就业机会；所谓提质，即是在贫困人口工业就业中提升自身人力资本水平，地区政府可以通过岗前培训及与企业合作开展在岗培训的形式提升贫困人口进入工业就业的能力。这既提升了本地区人口素质，为工业发展提供合格的劳动力队伍，也有效改善了贫困人口劳动技能与自生能力，建立脱贫内生动力，实现地区高质量脱贫。

3. 合理使用扶贫资金，调动各主体积极性

贫困地区在扶贫资金使用过程中要避免由于政府主导的资金投放而形成企业对扶贫资金的依赖性和贫困户“等靠要”的脱贫惰性。应以培育产业、激励企业、提供稳定就业、调动贫困人口积极性作为扶贫资金使用目标。贫困地区政府应通过扶贫资金的投入推动本地工业体系建设、增加就业机会、减轻境内企业扶贫压力以及提升贫困人口人力资本水平。鼓励企业在接收资金的同时，增设贫困人口就业岗位、设立扶贫车间、提供就业培训，既实现了企业扶贫的社会公益目标，也有效地保障了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盈利性目标。建立贫困人口扶贫资金鼓励机制，引导贫困人口通过主动脱贫获取资金奖励与扶持，由被动脱贫向主动脱贫转变。

参考文献:

- [1]中国网. 国务院新闻办就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有关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EB/OL]. http://www.gov.cn/xinwen/2020-03/12/content_5490339.htm, 2020-03-12.
- [2]叶初升, 张风华. 政府减贫行为的动态效应——中国农村减贫问题的 SVAR 模型实证分析(1990-2008)[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1, (9).
- [3]范和生, 武政宇. 相对贫困治理长效机制构建研究[J].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 2020, (1).
- [4]汪三贵. 在发展中战胜贫困——对中国 30 年大规模减贫经验的总结与评价[J]. 管理世界, 2008, (11).
- [5]王书斌. 国家扶贫开发政策对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溢出效应吗?[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8, (3).
- [6]梁栋, 吴惠芳. 农业产业扶贫的实践困境、内在机理与可行路径——基于江西林镇及所辖李村的调查[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1).
- [7]杨龙, 李宝仪, 赵阳, 等. 农业产业扶贫的多维贫困瞄准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
- [8]朱玲, 何伟.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减贫 40 年[J]. 劳动经济研究, 2018, (4).
- [9]钟甫宁. 劳动力市场的调节是农民增收的关键——评《农村发展与增加农民收入》[J]. 中国农村经济, 2007, (5).
- [10]翟军亮, 吴春梅. 农村贫困治理的范式转型与未来路径——兼议产业精准扶贫的推进路径[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
- [11]郭晓鸣, 虞洪. 具有区域特色优势的产业扶贫模式创新——以四川省苍溪县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 2018, (5).

-
- [12]王凯, 林惠, 甘畅, 等. 集中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的时空耦合关系——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 经济地理, 2020, (2).
- [13]陈超凡, 王赞. 连片特困区旅游扶贫效率评价及影响因素——来自罗霄山片区的经验证据[J]. 经济地理, 2020, (1).
- [14]谢双玉, 李琳, 冯娟, 等. 贫困与非贫困户旅游扶贫政策绩效感知差异研究——以恩施为例[J]. 旅游学刊, 2020, (2).
- [15]陆远权, 蔡文波. 产业扶贫的多方协同治理研究——以重庆市 X 县为例[J]. 重庆社会科学, 2020, (1).
- [16]林艳丽, 杨童舒. 产业精准扶贫中企业、贫困户和地方政府行为的演化博弈分析[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
- [17]黄承伟, 邹英, 刘杰. 产业精准扶贫: 实践困境和深化路径——兼论产业精准扶贫的印江经验[J]. 贵州社会科学, 2017, (9).
- [18]刘芳, 徐兴文. 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产业扶贫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基于云南 M 彝村的经验[J]. 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9, (6).
- [19]林移刚, 杨文华. 我国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困境与破解研究: 基于生产要素视角[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2).
- [20]张琦. 企业参与扶贫开发的机理与动力机制研究——以陕西省“府谷现象”为例[J]. 中国流通经济, 2011, (4).
- [21]陆汉文, 李文君. “有用无效”: 贫困人口能力建设的结构性困境——以豫西 Y 县农村实用技术培训为例[J]. 贵州社会科学, 2017, (4).
- [22]李小云, 于乐荣, 唐丽霞. 新中国成立后 70 年的反贫困历程及减贫机制[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 (10).
- [23]张凤华, 叶初升.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农村减贫——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当代财经, 2011, (12).
- [24]Ruben R., Marrit V. D. B.. Nonfarm Employment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of Rural Farm Households in Honduras [J]. World Development, 2001, 29(3): 549-560.
- [25]张立群, 陈宇宙. 以新型城镇化推进减贫研究: 一个文献综述[J]. 社科纵横, 2015, (10).
- [26]朱捡发, 陈旭明. 基于钻石模型视角下南康家具产业集群效应研究[J]. 东方企业文化, 2019, (S2).